

毛澤東 與中國農民

張俊誼 著



陝西人民出版社

毛泽东与中国农民

张俊谊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陕)新登字 001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毛泽东与中国农民 / 张俊谊著. —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3

ISBN 7-224-06725-3

I. 毛... II. 张... III. 毛泽东 (1893~1976) — 生平事迹 IV. A7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15636 号

书	名: 毛泽东与中国农民
作	者: 张俊谊 著
出版发行:	陕西人民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邮编: 710003)
印	刷: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	本: 890mm×1240mm 32 开 14.875 印张 5 插页
字	数: 358 千字
版	次: 2003 年 12 月第 1 版 200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2000
书	号: ISBN 7-224-06725-3 / A · 64
定	价: 30.00 元

序

前不久，我高中时的同学张俊谊拿来书稿《毛泽东与中国农民》并要我为之作序。像这样的事，过去也作了一些，但从未认真想过有没有资格去作的问题。也许是面对老同学的作品，才勾起我对这个问题的思索。以我看，大凡写序者，理应具备三个条件：第一，他是名人或权威，因为你是名人或权威，人家才乐于找你，你作序或许会对被序作品增点光彩什么的；第二，你必须对被序作品本身及它所涉及的领域研究较多，颇为熟悉，至少也应有所研究，具有一定发言权；第三，你应对作品的作者有一定的了解，对他的研究活动具有一定信任度，乐于对之发言。对照这三条，首要的名人或权威身份我是很不够的。不谦虚地说，我这个“半路出家”的理论工作者，从教近20年，虽辛勤耕耘不止，但成就并无太多，充其量也不过是个小有名气之人，决不敢以名人、权威自居。说到对书中涉及内容的研究，我虽出生在乡村，后也在农村工作过，多年关注农村问题，又是“毛泽东时代”走过来的人，却也不敢说够上作序的“格”。惟有第三条，倒是绰绰有余。因为我与俊谊同窗五年，又有经历“文化大革命”洗礼的情谊，彼此不仅熟悉，而且够上交情甚深。也许正是这一条，他抛开我在资格上的不足和缺陷，决定给了我这个任务；也是因为这一条，我没有推辞地答应了他的要求，同时想借这个机会讲讲

有关农民问题的看法。

首先，我认为研究毛泽东与中国农民这个主题是十分重要的。可以说，农民在中国社会的几千年中始终是最大的群体，时至今日仍然如此。毛泽东在他革命的一生中非常重视农民问题，十分认真地研究和解决农民问题。与其相统一，毛泽东对农民的态度以及关于农民的思想观点，成为他制定革命政策和党的方针、路线的最重要的依据之一。粗略地说，在整个民主革命阶段，毛泽东关于农民的思想观点是正确的和非常英明的，这也是他成功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重要支撑。而在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对农民的态度就出现了偏离，他看到了农民问题的严重性，却过多地沿用了革命战争时期的“阶级斗争”观点认识问题，力图用“革命”的手段改变小农经济。于是我国农业合作化的步伐一步一步比一步快，农村“公有制”的“纯度”一段比一段高，而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却很少让人们能感觉得到。于是就又有了在他老人家百年之后，亿万农民自发“造反”搞联产承包，“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被否定。这个结局是毛泽东生前未曾想到的，却成了历史！显然，毛泽东关于农民的思想观点，实则是其领导整个中国革命建设中方针、政策、路线成败的典型或缩影，中国农民、农业、农村问题的发展变化，反映了中国经济、社会变革的基本轨迹。

还必须看到，解决好农民、农业和农村问题，依然是当今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大难题。中国现在还是世界上农民人数最多的国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作为较长一段时期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宏伟战略目标，而这个任务在很大程度上亦是农民、农业、农村的发展和变革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在总结“文化大革命”路线错误的基础上，我们以加快发展生产力为基本定位，尊重农民的自主选择，在全国广大农村实行了以联产承包为基本方式的经

济体制改革，使受压抑的农民创造力得到了释放，不仅解决了长期发愁的吃饭问题，而且使整个农村经济出现了巨大的突破和发展。尤其是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小城镇建设的蓬勃兴起，大批农民“离土”创业和进城就业，已成为整个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建设中最耀眼的亮点，也预示了新的农民、农业、农村变革时代的到来。可是从整体上说，目前农民仍然是全社会中贫困程度最大的一个群体，农业仍然是国民经济发展中最薄弱的环节，农村经济仍然是制约现代化实现的主要障碍。所以，正确地研究和认识历史上处理农民、农业、农村问题的经验和教训，对于当代中国依然是很有必要和具有重大历史价值的。

其次，面对“三农”问题的严重性，我们一定要在有关认识 and 政策措施上形成新的突破。几年前，我曾发表过一篇强调确立以农业和农村经济为基本增长点的新发展观的文章。本文提出，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开始由传统的卖方市场逐步转变为买方市场。经济发展面临的难题，不只是某个产业更新改造的问题，而是全社会经济结构整体换代和“上台阶”的问题；既是生产力水平问题，又是消费能力问题；既是当年增长目标实现问题，又是谋求一个时期或阶段性的快速增长和持续发展问题。造成这种局面的深层根源在于城乡差别，农民收入水平相对较低，农村消费能力严重不足。因此，要使中国经济发展取得新的阶段性突破，形成一种长远健康而不是短暂波折的快速增长，根本是应做好农业和农村经济这篇大文章，树立把农业和农村经济作为全社会经济发展基本增长点的新发展观和政策目标定位，从加大对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投入入手，推动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快速发展；再通过农业生产和农村快速经济发展，提高农村人口消费能力，进而以农村人口购买力提高和农村市场扩展，形成全社会消费需求高档次创新；最终达到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新飞跃，带

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历史跨越。

这里还需指出的是，提出以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为基本增长点，即意味着在解决“三农”问题上的重大观念创新。长期以来，我们一直说“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并不断强调要加强和充实这个“基础”。而这种认识的基本思路是，认为农业是一种特殊的生产，关系到人民的吃饭问题，中国又是一个大国，吃饭问题历来决定社会能否安定，影响经济全局的发展，所以必须首先保证农业“不出大问题”。显然，在这种认识中，所谓的“基础”仅仅是一种消极和被动的作用，似乎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也不会有哪一天农业和农村经济能够走在经济发展的前列，它们始终处在要人“支持”和被“保护”、“充实”、“加强”的地位。有谁还会指望让其去成为带动经济发展的增长点呢？而提出农业和农村经济为基本增长点则认为，农业是“基础”，又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创新点；由于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滞后往往制约全社会经济发展，而这种约束的突破或农业和农村经济的领先发展，又可以转化为全社会经济的强大带动力；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需要一定投入，但这种投入本身也是经济开发行为，具有非常巨大的增值潜力和社会经济价值。

换一个角度来看，“三农”问题核心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利益关系。从毛泽东领导农民开展民主革命到现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始终贯彻着同农民利益的处理。凡是正确的领导和成功的实践，都是重视了让利于农民和对农民利益的保护。反之则是与农民争利，侵犯农民的利益。在现实中，这后一种行为仍很严重，并且非常普遍。中国的农民勤劳而善良、朴素而谦让，却也历来成为最大的弱者。他们往往承担着超过他们应有负载能力的社会责任和经济负担。单就现实中的经济关系而言，农民提供给国家的仍比国家给予他们的要大得多。这种过重的负担，使

他们自己生活贫困，也使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发展缺少投入。我们不要求对农民和农业有太多的“反哺”，只求能有一种真正的平等交换。果能如此，情况就会好得多。这也许就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所在。

总之，中国的“三农”问题，既是历史问题，又是现实问题；既是发展问题，又是改革问题；既涉及农民自身利益，又涉及社会发展。处理好坏，关系甚大。在“毛泽东时代”，由于政策之失误，造成农民生产积极性低落，农业发展缓慢，却反过来认为农民“落后”，想“走资本主义道路”，成天地批评他们、“改造”他们，导致了整个党的路线严重“左”化。这是沉痛教训。今天如果我们继续漠视农民在经济上的沉重负担，不去积极支持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加快发展，相反责备农民无能，认为是他们拖了全社会发展的步子，其同样会出大乱子。因此，解决“三农”问题，首先要转变观念，重新深化认识问题的重要性，用积极创新而不是消极被动的观念看待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从而在调整利益关系上下工夫，彻底扭转对农民利益的侵犯，加大对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投入。历史早已证明，广大农民富有非常巨大的创造力，只要领导得当、政策对头，他们会干出惊天动地的事业来。

最后我还要指出，张俊谊在他的书中以丰富而翔实的资料，采用以叙为主，夹叙夹议的笔法，比较客观公正地告诉我们，毛泽东这个农民的儿子，在他的一生中如何重视同农民的关系，把握对农民的态度。其有成功，也有失误。成功时受到农民的拥戴，做了农民的“大救星”，失误时事实上站到了农民的对立面，给农民带来了大灾难。这决没有贬低毛泽东的伟大，而是如实地让他走过的路去说话。这种态度也是我所赞同的。而且我所强调的是，总结毛泽东的成败，一定要转化为历史的经验，把它当做一面镜子，对照地解决好今日的“三农”问题，从而用“三农”问题解

决的大突破，推动整个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大飞跃。

曹 钢

2003年9月20日

目 录

序	1
引 言	1
韶 山 石	7
读“大书”	17
播 火 者	27
金 钥 匙	61
延 安 风	98
解 放 歌	152
恢 复 篇	194
集 体 路	214
跃 进 热	254
渡 难 关	339
斗 争 乐	377
结 束 语	444
参考书目	463
后 记	465

引言

历史的脚步匆匆而过，21 世纪的钟声刚刚敲响。

我们正站在一个新时代的起点。

20 世纪是世界腾飞的年代，人类乘着宇宙飞船，翱翔于太空；20 世纪是英雄辈出、群星灿烂的年代，英雄叱咤风云，活跃于世界舞台。

20 世纪也是中国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年代。当 20 世纪的日历刚刚揭开第一页的时候，中国正闹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入侵中国，烧杀抢掠，《辛丑条约》赔款白银 4.5 亿两，连利息在内 9.8 亿两，中国套上了更沉重的枷锁。接着是辛亥革命，1912 年成立了中华民国，清朝皇帝从金銮宝殿的龙椅上跌落下来，但是不少人仍做着各种各样的皇帝梦。接着是五四运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1949 年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中国又有一系列的政治事件：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反右运动、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各项改革，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践与探索，古老的中国获得了新生，以崭新的面貌屹立于世界东方。

百年三万六千日，风风雨雨动心魄！

上溯到 19 世纪，鸦片战争后，外国侵略者的铁蹄肆无忌惮地践踏祖国母亲的躯体，母亲在呻吟、在挣扎，中国人民堕入痛苦的深渊之中。

“长夜难明赤县天”，妖魔鬼怪舞蹁跹，人民何时可以见晴天？

中国是个古老的帝国，古老的帝国的人民盼望出现奇迹，盼望有一个拯救其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救星，救星在何处呢？马克思说：“如爱尔兰维修所说的，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马克思《1849 至 1850 年法兰西阶级斗争》）

中国需要伟大人物，人民盼望伟大人物，历史创造伟大人物。

于是，一个个人物在中国这个大舞台上，扮演了各种各样的角色，演出了各种各样的剧目。五彩缤纷，千奇百怪，有声有色，波澜壮阔。

20 世纪中国经历了三次历史性巨大变化，产生了三位站在时代前列的伟大人物：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

但是，在 20 世纪影响中国最大而改变了中国命运的是谁呢？应该说是毛泽东。

毛泽东用他自己的智慧、魄力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改变了中国。

美国斯图尔特·施拉姆《在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中说：“1976 年 9 月逝世的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是一位世界性人物。对他的评价如果用通常对世界性人物的评价来估量是很不够的。这不仅是因为他在领导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里，领导中国人民恢复了国际地位，进行了国内现代化事业，而且还因为在那个时期的大大部分时间里，他无愧于国际马克思列宁主义，

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第一流实践家和革新家之一。

“对这位中国领导人的伟大，他的成就及其持久性，应该如何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的问题，人们可能有争论。但我相信没有人否认，在我们这个世纪里，毛比任何人都更深刻地影响了人类的多数。而且即使在他死后，这一点也仍有说服力。这是从世界的角度来说的。因为在世界的范围里，人们不得不把他与列宁这样的人物相比较。如果只就中国来说，那么具有像毛这样气质的人物，至少近二百年来未曾有过，如果曾经出现过的话，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就不会这样低下，在我们的时代里对毛的挑战就会小得多。毛是我们时代的巨人。”

中国是一个农业人口众多的国家，中国有的是汪洋大海的小农经济，有的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农村村社。“在中国农业与手工工场业直接结合，这就大大节省钱财又节省时间，因此就给大工业产品以最强的抵抗，因为大工业生产产品价格是包含着这些生产产品的流通过程中处处耗去的不生产费用。”（马克思《资本论》）“在从前的时候，中国旧式犁头……像猪仔或田鼠一样，只掘开泥土，但没有作田沟，且没有将泥土翻转。”“一般说来，在这种耕种制度之下，农业生产率的代价就是厉害耗费人类的劳动力，使这些劳动力不能参加其他的生产部门。”（马克思《资本论》）“每一个农户差不多都是自给自足的，都是直接生产自己的大部分消费品，因而他们取得生活资料多半是靠与自然交换，而不是靠与社会交往”。他们“是一些同名数相加形成的，好像一袋马铃薯是由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693页）。

中国村社极其原始、极其稳定，而家庭是其最基本的单位。

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支撑中国村社大厦的梁柱，孔孟的经典著作是中国村社制度的灵魂。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对中国村社制度的特点进行了非常精辟的论述。他说：“一、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农民不但生产自己需要的农产品，而且生产自己需要的大部分手工业品。地主和贵族对于从农民剥削来的地租，也主要的是自己享用，而不是用于交换。那时虽有交换的发展，但在整个经济中不起决定的作用。二、封建的统治阶级——地主、贵族和皇帝，拥有最大部分的土地，而农民则很少土地，或者完全没有土地。农民用自己的工具去耕种地主、贵族和皇室的土地，并将收获的四成、五成、六成、七成甚至八成以上，奉献给地主、贵族和皇室享用。这种农民，实际上还是农奴。三、不但地主、贵族和皇室依靠剥削农民的地租过活，而且地主阶级的国家又强迫农民缴纳贡税，并强迫农民从事无偿的劳役，去养活一大群的国家官吏和主要的是为了镇压农民之用的军队。四、保护这种封建制度的权力机关，是地主阶级的封建国家。如果说，秦以前的一个时代是诸侯割据称雄的封建国家，那末，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就建立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仍旧保留着封建割据的状态。在封建国家中，皇帝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在各地地方设官职以掌兵、刑、钱、谷等事，并依靠地主绅士作为全部封建统治的基础。”

中国村社制度是一个超稳定的庞然大物。“这些自给自足的村社经常以同一形式重新恢复起来，它们被破坏了，又在原处用原有名称重新产生，它们的生产结构的简单就是以解释亚洲社会不变性的秘密。亚洲社会的不变性与亚洲国家之经常被破坏而重新建立，与它们朝代之迅速更换，恰恰相反。这个社会基本经济成分的结构，并不被政治范围内发生的风暴所惊动。”（马克思《资本论》）

中国的乡村社会，就是中华帝国的缩影。

中国历代的农民，就生长在这种封闭的村社制度下，过着贫穷困苦、奴隶式的生活。

中国农民就生长在这块深沉厚重的土地上。

当最低的生活条件也没有的时候，农民们只好揭竿而起，铤而走险，举起了造反的大旗，走上了反抗的道路。

成者王侯败者寇。

每一次反抗都是一场暴风骤雨，都是刀光剑影，都是血海火天。

暴风骤雨过后仍然是沉闷、停滞、封闭、保守。

中国爆发了大大小小数百次农民斗争，或曰农民反抗，或曰农民起义，或曰农民暴动。

可以说，一部中国历史，就是一部农民命运史，一部农民灾难史，一部农民辛劳史，一部农民斗争史。

不了解农民，就不知道中国。

知道了农民，就知道了中国。

毛泽东是中国农民的儿子，他和农民有血肉联系。他熟悉农民，了解农民，热爱农民，因而，他找到了成功的钥匙，打开了胜利的大门。

毛泽东像一个辛勤的农夫，用毕生的心血和汗水，耕耘在中国这块土壤上，撒播下自己理想的种子，长出希望的绿苗。

1942年冬天，陕北佳县农民李有源，望着秦晋高原上升起的一轮红日，触景生情，唱了一首民歌《东方红》：

东方红，

太阳升，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他为人民谋幸福，

呼儿嗨，

他是人民大救星……

这首陕北民歌由陕北黄土地唱到全中国，传到全世界。

这首歌是农民心里的歌。中国农民盼望大救星，歌颂大救星。

毛泽东生前为农民拥戴，去世后仍为农民崇敬。

不了解毛泽东和中国农民的关系，就不了解毛泽东。

因之，研究毛泽东和中国农民的关系，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课题。

我们沿着毛泽东当年走过的道路寻找……

红旗卷起农奴戟。我们似乎可以看到毛泽东率领农民，举着他的旗帜，在呐喊着，在抗争着。

喜看稻菽千重浪。在中国生机勃勃的广袤的农田里，我们似乎可以看见走着高大魁梧的毛泽东……

韶山石

湖南山美水秀，人杰地灵。湖南民风淳朴，湖南人喜食辣椒，勤劳倔强，爱国爱乡，勇于反抗。“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是一句非常古老的谚语。近代，湖南还有“若欲中国真灭亡，除非湖南人死光”的谚语。“老子不怕邪”，是湖南人的口头禅。近代史上，湖南出了不少风云人物，著有《海国图志》的魏源是湖南邵阳人；创办湘军，有《曾文正公全集》的曾国藩是湖南湘乡人；为戊戌变法流血牺牲视死如归的谭嗣同是湖南浏阳人；著有《警世钟》、《猛回头》，以身投海、唤起民众的陈天华是湖南新华人；组织华兴会进行推翻清朝的黄兴是湖南善化人；宋教仁是湖南桃源人……

19 世纪末，韶山又出了一个扭转乾坤的毛泽东。

韶山是南岳七十二峰之一的岳麓山一脉，韶者，美好也。相传舜帝南巡，他由京城蒲坂出发，过黄河，跨长江，涉洞庭，经过湘中山野，极目一望，到处是郁郁葱葱的松林，青青翠翠的修竹，山青水绿，令人心旷神怡。于是舜帝兴致勃勃，依山奏鸣“箫韶九成”——即韶乐。这韶乐优美动听，竟引来凤凰起舞，彩霞